

# 越南文獻與碑誌資料中的李常傑

耿慧玲\*

## 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是以中國史書、越南史書及越南其他文獻與銘文資料來重現一位越南歷史人物—李常傑的生平。

越南在五代時期逐漸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一直到李常傑率眾入侵欽、廉、邕州造成宋朝極大的挫敗，自此之後，宋朝默認越南的獨立地位，越南史家稱之為「古今第一武功」，李常傑正是領導這一次戰役的重要人物。然而在中國的史書記載中並沒有「李常傑」的事蹟，透過中、越的史籍及地方文獻及刊刻的碑銘，可以知道，李常傑世為簪纓，其父郭盛溢曾任李太宗時的太尉，常傑二十歲清身入宮侍太宗，聖宗時因從征占城，功拜輔國太傅、遙授諸鎮節度、同中書門下、上柱國、天子義弟、輔國上將軍、開國公，經略清化、乂安兩地，仁宗即位，李常傑任太尉與靈仁太后共掌政權，發動侵宋戰爭，鎮守九真郡十九年，長期擔任宰輔，是越南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在中國與越南的史書中均沒有對於李常傑生平的完整敘述。因而對於李常傑真正的身份、在歷史上的地位都沒有清楚的陳述，本論文運用內外考證方式，使用較少見之越南碑銘資料，重現李常傑的生平。

關鍵詞：越南、李常傑、李朝、碑銘

## 一、前言

中國是一個好記載的民族，不僅僅是對於中國中原核心地區有豐富的記載，同時對於周邊的民族與政權也有相當程度的記載，這對於整個亞洲甚至歐洲部分地區的歷史研究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就歷史的發展而言，中國文化的發展是由北而南。廣大的南方土地，在中國中原文化尚未到達之前，原是百越民族聚居之區，但當中國文化的拓展，涵化了整個南方，中國文化圈的形成也就在這樣的狀況下逐漸成形。然而中國長期政治的發展均以北方為主，政治與戰略上的考量，使得學術研究也偏向於長城內外。相對而言，對於中國南方的研究是目前可以有成長空間的一塊領域。

作為一個長期以中國漢字為書寫系統的國家，越南有與中國相似的記載習慣，無論是官方的史記或是地方的文獻，甚至於刊刻的碑銘，其數量都十分的豐富，然而，越南史籍本身也存在著許多論述、記載上的問題，畢竟她不如中國長期建立的文字記載系統那樣完善。因此，當進行越南歷史或文化的研究時，不僅僅是要運用中國或越南的資料，更需要針對內容去作參合考校。本文即欲運用中國與越南史籍及相關資料，尤其是屬於一手史料的碑銘資料，重現中越歷史上一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位重要的人物。

## 二、一場改變歷史的戰爭

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宋史·神宗本紀》簡簡單單的記載了一件事：

戊寅，交趾陷欽州。<sup>1</sup>

此外，便沒有對於這一個事件有所敘述，在同書列傳第二百四十七〈外國四·交趾〉中對於這個事件也沒有一個清楚的記載，<sup>2</sup>《續資治通鑑長編》只簡單的說：

（十一月己巳）廣西經略司言，諜報交趾、廣源州集鄉兵，欲圖入寇，又言古萬峒為蠻賊攻劫。詔：「與賊戰有功人速以名聞，被焚略之家，量與存恤。」<sup>3</sup>

《宋會要·蕃夷四》也沒有以很多的文字著墨：

八年，十二月五日，廣南西路經略司言：「交趾以舟師駐湖陽鎮，謀以兩路入寇欽、廉州。」二十一日，以交趾入寇，攻陷郡縣，殺傷吏民，詔廣南路經略司嚴為守禦之備置，安南路經略司預經制其事，將討蕩其巢穴也。<sup>4</sup>

只有《文獻通考·四裔考》對於這一次的戰役有較為清楚的交代：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交人畏之，（劉）彝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熙寧）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廉土丁八十<sup>5</sup>守城，皆驅令負擔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將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鼎為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招討使，李憲為副使，帥大軍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招討使，改鼎副之。<sup>6</sup>

這樣的記載方式，似乎如同中國其他的戰役一樣，並不是十分的特殊，然而，在

<sup>1</sup> 《宋史》（[元]脫脫等撰，台北，鼎文書局影印中華書局本，1975~1981）卷十五〈神宗二〉，「熙寧八年十一月」條，頁 289。

<sup>2</sup> 在《宋史·外國傳》中，對於熙寧八年的戰役含糊籠統的記載著：「（熙寧）五年三月，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為弔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頁 14069），按，本段記載並未載明熙寧八年戰役，其所錄詔書為熙寧十年初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九：「初，熙寧十年，乾德言，乞詔回大兵，即遣使謝罪奉職貢，詔從其請，令安撫司遣人畫定疆界。」（頁 8372）及《文獻通考》（[宋]馬端臨撰，台北，世界書局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史部第一四九冊，1988 年）卷三百三十〈四裔考七·交趾〉葉三十一（頁 235-410）。

<sup>3</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5 第一版）卷二百七十「神宗熙寧八年十一月」，頁 6621。

<sup>4</sup> 《宋會要輯本》（[清]徐松輯，台北，世界書局，1977 年再版），卷一萬一百二十二，〈蕃夷四〉，葉十七（頁 7731）。

<sup>5</sup> 《大越史記前編》（[越]吳時仕、黎嵩等編撰，北城學堂藏板，景盛八年（1800）印，十七卷本，漢喃研究院書號 A.2/1-7），作八千。

<sup>6</sup>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四裔考〉，葉三十（頁 235-410）。

越南的史記中，對於這一次的戰役，卻有完全不一樣的態度。在《大越史記前編·本紀》中，對於戰爭的傷亡是這樣的記載：

帝(李仁宗)怒，命李常傑、宗奩領兵十餘萬，分三道擊之…常傑連陷欽、廉州，殺土丁八千人<sup>7</sup>。宗奩…丙辰五年…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固守，我軍攻之，四十餘日囊土傳城而登，城遂陷，緘令其家屬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降者，於是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並欽、廉死亡者幾十餘萬。常傑等俘虜三州而還。…三月，宋以郭達為招討使，趙鼎副之，合占誠、真臘兵來侵。…命李常傑迎擊宋師于如月江，大破之，宋兵死者千餘人。郭達引退，復取我廣源諸州。

8

越南史家吳時仕對於這一次的戰役有如下的評價：

我國與北朝交兵多矣，南帝以前，勝敗不常，迹陳事往。其後吳先主白藤之捷；黎大行諒山之勝；陳仁宗之敗唆都，俘烏<sup>9</sup>馬兒，走脫驩，皆折強虜於方橫，凜國事之難，犯勝克之烈，為本國侈談，然皆敵至其國，不得已而應之，勞逸之形殊，主客之勢異，若夫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十萬橫行，深入客地，破三州之眾，如振槁然。在境無敢撓其鋒，還師無敢躡其後，如此用兵，非本國一曠事哉！<sup>10</sup>

且此次戰役不僅僅是一場值得誇耀的戰爭，對於李朝後來的發展，甚至於越南獨立於中國中央政權的直接統治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這一場戰爭，導致以下的後果：

按，是役我國能暢其兵威，宋人以我方強，思以恩義柔撫之，自是貢聘之遺，文書之式，皆不苛責，惟恐忤其意以生邊釁。至英宗時…我國書惟列大臣數名，其印文曰「南越國印」。後更用中書門下之印，宋人皆不能詰，輒以略遠之說自解。其後國名之賜，增壯天南，則李氏之所得于宋亦多矣。

11

越南與中國南方從上古時期，即因山水相連而產生了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在長期地理之間的自然融合，也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相互涵化過程。自秦始皇征嶺南，設置象、南海、桂林三郡始，<sup>12</sup>中國即開始在自然的涵化過程中，加入了許多人為的政治與軍事的推動力量，有計畫的將中國的各種力量拓殖到越南地區，尤其是越南北方地區；西漢以後，更在原本南越國的基礎上，設立了交趾、

<sup>7</sup> 《文獻通考》作八十人。

<sup>8</sup> 《大越史記前編》卷三，葉十四～十六。

<sup>9</sup> 原誤作「鳥」。

<sup>10</sup> 《大越史記前編》卷三，葉十五。

<sup>11</sup> 《大越史記前編》卷三，葉十五下～十六上。

<sup>12</sup> 秦始皇設置的三郡中，象郡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統治到越南，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一個焦點，其間鄂盧梭與馬思伯樂兩人不同的見解引發了嚴重的爭執，之後，許多的學者依據新資料、新解釋對於秦始皇征嶺南的時間、將領、疆域重新檢討，但仍沒有定論，其間論文甚多，請參考余天熾等著《古南越國史》，(廣西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1)。然而，雖說象郡是否包含今越南北方，學界尚有爭議，但如果秦始皇已於廣東、廣西地區設郡，越南北方欲不受到秦朝政治力之影響，恐非易事，因此，秦始皇的象郡設置，基本上反映出當時對於亞洲東南地區的影響。

九真、日南等郡縣，使得越南北部內屬中國，成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一環。這也就是越南歷史中的「北屬時期」。歷經一千多年政治上的直屬，越南在唐末五代時期，趁著北朝（中國）中央控制權力逐漸衰落之時候，則依據天險，起來擺脫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其間歷經曲顛、楊廷藝、矯公羨、吳權等以節度使的身份建立起強固的地方勢力，自外於中國中原地區的政治範疇，也與十國時期的南漢逐漸形成對抗的局面，然而，內部權力的爭奪使得越南地區在吳權之後陷入群雄競起各據郡邑的割裂局面，也就是史稱的「十二使君」時期。最後由丁部領、黎桓、李公蘊遞代承襲，重新建立起統一的勢力。誠如吳時仕的評論，在熙寧八年—亦即李仁宗太寧四年之前越南地區有許多反抗中央政權的事件，例如：西元 40 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二徵夫人略定五十六城，自立為王；<sup>13</sup>西元 248 年（東漢延熹十一年，三國吳赤烏十一年）九真趙姬的起事；<sup>14</sup>西元 541 年（梁武帝大同七年）李賁在九德郡起兵，北逐蕭諮，南征林邑，自稱「南帝」，又建國號曰「萬春」，都龍編；<sup>15</sup>其後，趙光復據夜澤之險，在位 23 年（548~570）；<sup>16</sup>722 年（唐玄宗開元十年）梅（枚）叔鸞起兵，自稱黑帝；<sup>17</sup>791 年（唐貞元七年）唐林人馮興包圍州治；<sup>18</sup>931（後唐明宗長興二年）楊廷藝攻殺南漢軍隊；<sup>19</sup>然而，這些建國立號的時間都不能長久，不旋踵重又受到中國中央政權的掌控，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只是中國邊境地區的一些可控制的民變而已。從 1010 年到 1400 年，越南從北屬時期走向獨立自主的時代，史稱「大越復興時期」，<sup>20</sup>而李朝正是這個走向獨立自主時期的關鍵時代。熙寧八年及其後因而發生的後續戰爭更是這個關鍵時代的關鍵戰役。在越南的歷史中，領導這次戰役的統帥，更被當作是神祇供奉，越南有一本「皇越神祇總冊」記載著從古以來越南地區供奉的神祇，其中的「翊運廣威大王」，就是這次關鍵性戰役的統帥李常傑，《總冊》對於李常傑是這樣敘述的：

奉按國史，王德縣太和坊，姓李名常傑，仕李官至太尉、上將軍，平國內寇賊。代宗時<sup>21</sup>，取欽、廉、邕三州，史氏稱其十萬橫行，深入客地，在境無撓其鋒，還師無敢躡其後，為本國曠事第一武功，歷代褒封上等福神。

22

<sup>13</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外紀》（陳荆和編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叢刊第四二輯，昭和 59-61 [1984-1986]）卷三，頁 126。

<sup>14</sup> 同上注，頁 138~139。

<sup>15</sup> 同上注，頁 147~149。

<sup>16</sup> 同上注，頁 149~151。

<sup>17</sup> 同上注，頁 159。

<sup>18</sup> 同上注，頁 160~161。

<sup>19</sup> 同上注，頁 170。

<sup>20</sup> 根據越南史家的說法，越南歷史大致上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民族起源時期；二、北屬時期（公元前 111~公元 938 年）三、獨立自主時期（公元 938 年至十九世紀末）1、獨立自主初期（十世紀）2、復興時期（十一至十四世紀）3、盛治之時期；四、南北分爭時期（1592~1788）五、越南封建制度末期（19 世紀）。

<sup>21</sup> 作者按，代宗應作仁宗。

<sup>22</sup> 《皇越神祇總冊》（不著撰人，後黎朝景興四十六年以後，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原書編號 A.833，本資料來源為法國遠東學院微捲影印，Paris EFEO MF I.217）葉四十六。

越南史家潘輝注在其著作《歷朝憲章類志》卷九〈人物誌〉亦稱其為「古今武功第一」<sup>23</sup>。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國的史籍中竟無一字提到李常傑這個人，或許有人認為這次戰役中國記載不顯的原因，是因為越南過於誇大戰役的規模，但若繼續觀看後續的記載，則發現宋朝在這一次戰役只能以「慘敗」形容，《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

（熙寧）九年（1076）十二月破蠻泐里隘，次富良江，…富良去其國不遠，（郭）達不敢渡，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枕榔縣而還，達、嵩皆得罪。詔改廣源為順州，命西上閣門使陶弼知州事，餘皆即用其酋長。乾德（李仁宗）乞再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報之曰：…但以邕、欽、廉之民遷劫災馱，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德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以給示海道之遠也。…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也。<sup>24</sup>

這麼重要的戰役，其領導者為什麼在中國的史冊中卻沒有記載？瞭解了這一位領導者的相關資料，應該可以進一步瞭解越南與中國在那一段歷史中真確的互動關係。本文即欲以越南文獻及金石資料補充有關這一位重要戰役的領導者的生平。

### 三、找尋李常傑

在中越關係改變的歷史關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李常傑，沒有在中國史書中出現，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同樣的狀況，在中國的唐代歷史中也曾發生，那就是越南的另一位民族英雄—馮興。馮興在越南民間被稱為「布蓋大王」，受到「十五社同奉事」，這種崇敬的狀況，較之於越南歷朝皇帝均為隆重，<sup>25</sup>而「布蓋大王」的「布蓋」在越南語中即是父母的意思，<sup>26</sup>可見馮興在越南歷史與社會上的地位。其被崇祀的主要原因是馮興與其鄉人杜英翰反抗唐朝，攻入當時的安南都護府，據府即政，致使安南都護高正平憂憤而死。然而這件史事的記載也如李常傑的事跡一般，在中國與越南產生相當程度的落差。這當然可能因為中國傳統史書對於中央政府的一些舉措，經常性的會採取一些技巧性的方式來解釋或做選擇性的記載。<sup>27</sup>因而在中國的史書中，可能的疏漏，將會造成對於真實歷史的誤解。在本人的〈馮興考〉一文中，利用越南的文獻—尤其是越南的碑銘資料，將馮興的事件做了一些考釋，本文將再利用越南的文獻—尤其碑銘資料，對李常傑

<sup>23</sup> 《歷朝憲章類志》（潘輝注（一名潘輝浩）編撰，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館藏編號 A.1551/1-8），卷九〈人物誌〉，葉一下～二。

<sup>24</sup>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交趾〉，葉三十～三十二（頁 235-410～235-411）。

<sup>25</sup> 據《皇越神祇總冊》的記載：「丁先皇帝，十四社村奉事…黎大行皇帝，九社村奉事；中宗皇帝，四社奉事；臥朝皇帝，三社奉事。李太祖神功助勝皇帝，五社奉事。」頁 39。

<sup>26</sup> 《大越史記前編·外紀》卷七〈內屬隋唐紀〉：「俗謂父曰布，母曰蓋。」葉九。

<sup>27</sup> 請參見耿慧玲，〈馮興考—未見於中國新舊《唐書》的一位越南英雄〉，中國唐史學會，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已收入《越南史論》，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201～223。

的生平也作一些整理與分析。

在越南的歷史文獻中，《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史略》、《越史通鑑綱目》、《越史綱目節要》，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其中《越史略》的記載內容主要是以李朝及其以前之歷史為主，目前有兩個版本，一為中國守山閣叢書所收之《越史略》，一為經陳荊和先生校合的《校合本大越史略》。《越史略》的記載內容甚為簡略，對於唐代以前的記載多以中國史書為本，鮮少不同；然而從丁部領以後的記載，則多以越南本國立場著述，與中國史書頗有差異，其牴牾之處，可與中國史籍相參證，是研究越南李朝歷史重要的典籍。<sup>28</sup>

《大越史記全書》是越南歷代官方修史的集結，自陳太宗時即命史臣黎文休依據史料修撰《大越史記》，其內容自趙佗（趙武帝南越國）至李朝結束；後黎朝仁宗時，又命潘孚先修撰陳太宗至明人建國之間的歷史，亦名之曰《大越史記》；黎聖宗時，復命史臣吳士連編纂趙武帝之前的鴻彪紀及蜀氏紀，並合前述兩書成《大越史記全書》，其後歷朝皆有所增益，成為越南歷史最重要的一部官方史籍。《大越史記全書》有各種不同的版本，現在通用的是陳荊和先生編校的《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由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印行，陳荊和先生是越南史研究的大家，曾經整理過許多越南的文籍，對於越南歷史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編著之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史略》可以說是漢文界研究越南歷史必讀的文獻資料，但是，在陳先生的校定編輯過程中，也常將一部份的越南史家論述省略，故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應該要將陳荊和《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與，和北城學堂本《大越史記前編》；《校合本大越史略》與中國守山閣本《越史略》之記載作比較。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則是一部官修越南編年歷史，由阮朝國史館史臣潘清簡等人編纂，書籍編纂方式，採用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的編纂體例，注重所謂的「褒貶春秋筆法」，綱仿《春秋》，目仿《左傳》，綱舉目張，便於查閱。同時，針對舊史的錯誤，和相關資料之補苴，都可以與《大越史記全書》相參校。此外，鄧春榜著作之《越史綱目節要》，針對《越史通鑑綱目》再作疏注，亦為重要之越南史籍，與《越史通鑑綱目》間亦有相互補苴的功能。以上為主要史料之來源，他如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黎崩《安南志略》、不著撰人《皇越神祇總冊》、黎貴惇《見聞小錄》《芸臺類語》、高春育《大南一統志》等等，都是研究越南歷史重要之著作。

經查閱這些相關記載後，發現對於這樣一位重要的人物，越南史書的記載，亦十分的簡略。有關李常傑的生平，大約以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七〈名良將〉之記載比較完整，茲錄如下：

李常傑，昇龍太和坊人。少以資貌揚逸，清身充黃門祇候，侍太宗，累遷內省都知。聖宗，拜太保，授節鉞；天貺寶象二年，聖宗征占城，為前鋒

<sup>28</sup> 請參見《四庫全書提要》，（引自叢書集成初編《越史略》篇首，秦皇島，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

將軍，俘獲制矩，<sup>29</sup>以功拜輔國太傅、遙授諸鎮節度、同中書門下、上柱國、天子義弟、輔國上將軍、開國公。仁宗太寧四年<sup>30</sup>與宗晝伐宋，領十萬兵分進，攻欽州、廉州，陷之。宋廣西都監張守節將兵來救，常傑迎擊於崑崙關，大破之，斬守節于陣，屠邕州，俘虜餘民而還。是役也，提重兵入客地，宋人懾不敢動，聲勢震薄，為古今武功第一。既還，總諸軍伐占城，畫三州圖以進，以功陞太尉<sup>31</sup>。五年<sup>32</sup>，宋遣郭達總九將，合占、臘來侵，常傑迎擊于如月江大破之。龍符元年<sup>33</sup>進兼內侍判首都押衙，行殿內外知事。三年<sup>34</sup>，演州人李覺叛，又討平之；覺亡入占，誘占主寇邊。四年，復伐占城，破之。五年卒，贈入內殿都知、檢校太尉、平軍國重事、越國公，食邑萬戶。

常傑多謀略，有將才，歷事三朝，敗宋平占，勳望日重，親寵為諸臣冠，卒後，其坊民祀為福神，祈禱多應，累蒙歷朝褒封云。<sup>35</sup>

然而在這個記載中，很明顯的仍有許多需要填補的地方。

越南因為中國文化的融滲，在越南中部以北地區有大量的漢文金石銘刻資料，<sup>36</sup>根據 1998 年《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的研究，越南目前有金石拓片 30000 餘件，其中，有 20979 件為法國遠東學院在 1920 至 1930 年之間所蒐集之拓片，<sup>37</sup>其餘則為 1958 年以後越南國家之蒐集與摩拓，<sup>38</sup>同時，自 1983 年到 1986 年之間，河內文化所對河內市內和郊外之四郡四縣所有石刻、鐘銘進行摩拓工作，這些金石資料，充分反映出越南的歷史文化內涵。<sup>39</sup>1995 年收藏越南拓片最主要的機構越南漢喃研究院與法國遠東學院、臺灣嘉義的中正大學文學院進行國

<sup>29</sup> 《校合本大越史略》（創價大學亞細亞研究所叢刊第一輯，陳荆和編校，東京都，創價大學亞細亞研究所，1987）卷二，李聖宗神武二年夏：「四月，元帥阮常傑俘獲第矩於真臘界。」頁 60。

<sup>30</sup> 仁宗太寧四年即宋熙寧八年，西元 1075 年。

<sup>31</sup> 作者案，據《校合本大越史略》，仁宗神武四年夏四月八日，仁宗初即位以「大僚阮常傑為檢校太尉」，頁 61。

<sup>32</sup> 五年，為太寧五年，四月以後改英武昭勝元年，即宋熙寧九年，西元 1076 年。

<sup>33</sup> 龍符元年即宋建中靖國元年，西元 1101 年。

<sup>34</sup> 三年為龍符三年，即宋崇寧二年，西元 1103 年。

<sup>35</sup> 《歷朝憲章類誌》，卷九〈人物誌〉，葉一下～二。

<sup>36</sup> 越南古代銘刻資料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1、銘刻初期：這個時期約從七世紀到十四世紀，現存 77 件金石銘刻資料，內容包括最早的隋大業 14 年〈大隋九真郡寶安道場碑文〉、丁朝的陀羅尼經柱、李朝的佛寺碑銘及豐富多樣（紀功、記事、宗教、詩文等）性質的陳朝碑銘。2、銘刻發展時期：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現存約 6233 件拓片，包括後黎時期的帝陵碑和進士題名碑；及莫朝以後多樣的宗教之寺觀碑記亭碑、市肆碑、文址等碑銘；3、銘刻興盛時期：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約計有 4020 件拓片，這時期的銘文格式趨向一致，有規範化、簡單化的特色，大量的祠堂碑是其重要的內容。

<sup>37</sup> 根據越南學者黃文樓的統計，1920-1930 年法國遠東學院之蒐集與摩拓計調查了石碑、鐘銘 10,360 件，共得約 25,000 張拓片，其特色是針對當時越南全國所作的全面性的蒐集和摩拓，其缺點則是摩拓範圍只限於市鎮或大路附近，偏僻的地方，離城市較遠之山區則未有組織性、大規模的摩拓。此次蒐集之拓片品質一般來說都很不錯。

<sup>38</sup> 從 1958 年以後，越南在國家的支持下又新摩拓約四千張拓本，然可惜因其多半與上述遠東學院所拓重複，效果不彰。

<sup>39</sup> 見蘇爾夢、潘文閣主編，《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巴黎、遠東學院，河內、漢喃研究院，1998），〈序言〉，頁 LXII～LXIII；及耿慧玲、黃文樓主編，《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二集——陳朝（台北新文豐出版事業公司，2002），〈前言〉，頁 V～XIV。

際合作計畫，整理並按時代出版越南漢喃銘文，第一集共收錄北朝至李朝間（B. C. 111 年至 A. D. 1226 年）27 篇銘文，第二集收集陳朝 44 篇銘文，是目前對於越南銘文整理最系統及完整的著錄。根據第一集的資料，有五篇銘文與李常傑有關，可以做為文獻資料之增補，這些銘文分別是李仁宗會豐九年（1100）的〈安穫山報恩寺碑記〉、李仁宗天符睿武六年（1125）〈乾尼山香嚴寺碑銘〉、天符睿武七年（1126）〈仰山靈稱寺碑銘〉、李英宗大定十八年（1157）〈古越村延福寺碑銘〉及大定二十年（1159）〈鉅越國太尉李公石碑銘〉。其中〈安穫山報恩寺碑記〉〈乾尼山香嚴寺碑銘〉與〈仰山靈稱寺碑銘〉均為記載李常傑在九真地方建構佛寺的經過，對於李常傑與九真之間的關係，以及李常傑的生平歷世有相當重要的補強。〈古越村延福寺碑銘〉及〈鉅越國太尉李公石碑銘〉對於李常傑的生平資料較少，因為這兩篇碑銘的主角是另一位歷史人物杜英武，但是因為杜英武與李常傑家族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可以藉由這兩篇碑銘補充李常傑的家世。

由於碑銘的樹立是當時、事、人的一項記載，碑銘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要滿足後世對於特定事實的研究，因此在記載內容上有其「一手」史料的重要性。碑銘的記載固然有其限制，正如同韓愈在千百年前所云乃「諛墓之文」，但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性，諸如，碑銘若說誌主才德兼備、萬民擁戴，固不必信，但是敘說其擔任某官、某職、父某、母某則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度，因而碑銘是校證史料非常重要的資料。同時，碑銘具有自然採樣功能，運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記載人物的碑銘資料，其所呈現出的記載，可以作為歷史統合研究的重要參考。

下面即運用《歷朝憲章類志·人物志》之外的其他的文獻與碑銘資料，對於李常傑這一位歷史人物作一些考補。

#### 四、李常傑的生平歷世

根據上節《歷朝憲章類志》的記載，大致可以知道李常傑的生平歷事，不過對於一些關鍵性的時間或事蹟的記載，顯然並沒有真正清楚的說明。下面根據現有的文獻與碑銘將李常傑的生平作一整理與補充：

李常傑乃細江句漏縣人，<sup>40</sup>其父郭盛溢，李太宗時太尉，天感聖武五年（宋慶曆八年，1048）奉命征廣源州首領儂智高。<sup>41</sup>常傑二十歲清身入宮侍太宗，<sup>42</sup>累遷至內省都知。聖宗即位，常傑擢遷檢校太保，受節鉞；<sup>43</sup>天貺寶象二年（宋熙

<sup>40</sup> 〈鉅越國太尉李公石碑銘〉《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越]潘文閣、[法]蘇爾夢主編，河內漢喃研究院、巴黎遠東學院，1998，頁 163~171），頁 189；據頁 192 注 15，細江句漏縣即今北寧省順城縣。目前所有文獻均記載李常傑為昇龍太和坊人，當是後來改籍。

<sup>41</sup> 有關此次戰役，《通鑑綱目》云「討之不克，智高攻宋邕州，陷之」，餘本皆云「智高降」。《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二，頁 236；《校合本越史略》卷二，頁 55~56；《越史通鑑綱目》卷三，葉十三（頁 643~644）。

<sup>42</sup> 〈仰山靈稱寺碑銘〉《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越]潘文閣、[法]蘇爾夢主編，河內漢喃研究院、巴黎遠東學院，1998，頁 163~171）：「公弱冠之初擢入禁闈。」頁 165；本文作者案，《匯編》誤釋作「禁闈」。

<sup>43</sup> 《類志》作「拜太保，授節鉞」，〈仰山碑〉作「擢遷檢校太保」，頁 164。



寧二年，1069)<sup>44</sup>二月，李常傑隨聖宗征占城，為前鋒將軍；四月，俘占城主制矩，<sup>45</sup>因功拜輔國太傅、遙授諸鎮節度、同中書門下、上柱國、天子義弟、輔國上將軍、開國公，經略清化、乂安兩地，<sup>46</sup>太寧元年<sup>47</sup>（宋熙寧五年，1072）四月八日李常傑任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伊霍之量，使攝大政，<sup>48</sup>太寧三年，占城復擾邊，王安石以為越南為占城所破，可計取之，遂聯絡蠻峒，禁州縣與越南貿易，逼使越南發兵侵宋，常傑蘊廟筭、統水軍，殲殪宋軍，成就輔佐仁宗的大功業；英武昭勝初知愛州九真郡清化鎮諸軍事，<sup>49</sup>七年（宋元豐五年，1082）仁宗特命李常傑為清化一軍，賜封邑，此後駐守清化十九年。<sup>50</sup>其間，李常傑廣修廟宇，如仰山靈稱寺、乾尼山香嚴寺、安穫山報恩寺等皆是。靈稱寺建於英武昭勝年間，乃李常傑初至九真不久，因靈仁太后師懷信長老之託，於仰山建靈稱寺，<sup>51</sup>廣祐三年（宋元祐二年，1087）李常傑應太傅劉慶譚之請，共修九真乾尼山香嚴寺。<sup>52</sup>會豐八年（宋元符二年，1099）復率民人建報恩寺於古戰縣，歷時約一年。<sup>53</sup>龍符元年，常傑回都城，授內侍判首都押衙、行殿內外都知事；<sup>54</sup>龍符三年（宋崇寧二年，1103）李覺反，李常傑受命討之，覺敗，出亡占城；龍符四年（1104）常傑伐占城，擊破之，占城主制麻那復納二月所取地哩等三州。<sup>55</sup>龍符五年（1105）六月，太尉李常傑卒。<sup>56</sup>

在這樣的生平歷事中，有幾點值得討論，其一，李常傑出身太尉之家，世襲簪笏，但是李常傑入宮卻被清身，且根據記載，李常傑死後襲爵的弟弟李常憲，也被清身，他們兩人還被視作典範，《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五：

冬十月，賜范應夢錢，使自闈入侍。初，帝夢出遊，見神人指一人謂曰：

<sup>44</sup> 按，聖宗天貺寶象二年即宋熙寧二年，西元 1069 年，七月以後改神武元年，見《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東洋學文獻叢刊第四二輯，陳荆和編校，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1984 年）卷三，頁 244。

<sup>45</sup> 《大越史記全書》天貺寶象二年記載李聖宗征伐占城的事件時，並沒有李常傑的事蹟出現在內，唯《類志》云常傑任前鋒將軍，從征占城；又，《越史略》卷二，李聖宗神武二年夏：「四月，元帥阮常傑俘獲第矩於真臘界。」頁 60。案，阮常傑即李常傑，陳太宗建中八年六月「改李朝為阮朝，且絕民之望李氏也」。此後李姓在陳朝均改為阮姓，《大越史略》陳朝時著錄，故終篇以李作阮。

<sup>46</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三，頁 255：有「經訪清化、乂安吏民。」又，《大南一統志》（高春育等編，日本印度支那研究會影印，昭和十六年（1941 年）第二輯，卷十七，〈清化省下·廟祠〉：「在永祿縣午舍社，神姓李，諱常傑，…李聖尊朝常經略清化、乂安等處，因建寺于伊社之仰山，曰靈稱寺，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葉七下（頁 1764）。

<sup>47</sup> 案，〈仰山碑〉與《大越史略》均云神武年，然聖宗神武四年正月以後為仁宗太寧元年。

<sup>48</sup> 〈仰山碑〉：「神武中拜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襄國政。」，頁 165；又，《校合本大越史略》卷二：「（神武四年四月八日）是日，以大僚阮常傑為檢校太尉。」頁 61。

<sup>49</sup> 〈仰山碑〉，頁 165。

<sup>50</sup> 〈安穫山報恩寺碑〉《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越〕潘文閣、〔法〕蘇爾夢主編，河內漢喃研究院、巴黎遠東學院，1998，頁 163~171），頁 83~84。

<sup>51</sup> 〈仰山碑〉，頁 165；又，《大南一統志》卷十七〈清化省〉，葉七下（頁 1764）。

<sup>52</sup> 〈乾尼山香嚴寺碑銘〉，《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越〕潘文閣、〔法〕蘇爾夢主編，河內漢喃研究院、巴黎遠東學院，1998，頁 163~171），頁 153~155。

<sup>53</sup> 〈安穫山報恩寺碑〉，頁 83。

<sup>54</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54。

<sup>55</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54~255。

<sup>56</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55。

「此人可為行遣。」夢覺不知何人。一日朝罷幸城外，見一男子從學于城之南門，形貌酷似所夢人，召問之，應對如夢中間所語。欲授以行遣而難之，仍賜錢四百緡，使之自闔，賜名應夢，後累遷為行遣，蓋倣李朝用李常傑、李常憲舊例也。<sup>57</sup>

加上與李常傑一同修建乾尼山香嚴寺的劉慶譚，也是淨身的太尉，亦具有地方豪強的基本特色，可見「中官」在李朝特殊的地位。<sup>58</sup>

其二，有關李常傑授太尉的相關事宜，太尉官職的任命，可以充分反映出李常傑在李朝的權力結構。按越南李朝之官制，所謂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是宰相，<sup>59</sup>鄧春榜在《越史綱目節要》中對於李常傑任太尉一事，註解道：

李懲前黎諸王擁兵之禍，中外事權總於太尉，太尉內贊機務，外總戎機，無事則居中輔政，有事則銜命出征。<sup>60</sup>

可見太尉一職的重要性。李常傑授太尉的時間在史料中有兩個說法，一在李聖宗神武年間，一在李仁宗太寧四年。若照《大越史記全書》與《通鑑綱目》的記載，李常傑的授太尉，應該是與太寧四年占城之役有關，然而仔細觀察那一次的戰役，李常傑在這一次的戰役中是失敗的：

命李常傑總諸軍伐占城，不克，常傑乃畫布政、地哩、麻令三州山水形勢為圖而還。<sup>61</sup>

既然沒有成功因何會授太尉這樣的職任？這個時間是值得商榷的。若看〈仰山碑〉與《大越史略》的記載，則李常傑授太尉在聖宗神武末、仁宗太寧初，這個時間正是李朝改朝換代的時刻，常傑封太尉正可以如〈仰山碑〉中所述：

太寧初，今上明孝皇帝握圖即位，公遂以伊霍之量，使攝大政，可屬社稷。

<sup>62</sup>

證之以〈安獲山報恩寺碑記〉所謂「信乎六尺之孤可托，百里之命可寄」，說明仁宗即位之時，李常傑受到聖宗遺命，輔佐尚在幼年即即位的李仁宗，這時候授李常傑以「太尉」重職，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李常傑任太尉的時間應該是依照《越史略》〈仰山碑〉〈安獲山碑〉的記載。

其三則是李常傑與九真地區的關連。根據記載，李常傑在聖宗天貺寶象二年

<sup>57</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五，頁337。

<sup>58</sup> 相關論述，請參考作者〈越南李朝的中官研究〉，《2004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2005,12），pp.323~350；及1999,7,〈越南李朝太傅劉氏兄弟墓誌考證及其歷史意義——中越政治文化比較研究〉《朝陽學報》第五期，（台中霧峰），pp.151-192（已收入《越南史論》，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12,〈李英宗婚姻關係與權力結構研究〉，《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pp.481~498（2002，11，「古代中外關係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已收入《越南史論》，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

<sup>59</sup> 《歷朝憲章類志》卷十四〈官職志·官名沿革之制〉：「宰相之任，丁前名稱不可詳考，黎大行命官始以總管知軍民之職，總統國事，蓋其任也。李太祖初立，以陳鎬為相公，職名甚野；太宗嗣統始以輔國太尉秉政，均衡之任，即為宰相；至於仁宗，加以「檢校平章軍國重事」等字，則其名為雅馴，而職任亦重矣。」葉一下~二上。

<sup>60</sup> 《越史綱目節要》卷二〈李紀〉，葉二上。

<sup>61</sup> 見前註。

<sup>62</sup> 〈仰山碑〉，頁165。

即從征占城，爾後即開始經略清化、乂安兩地，此後在太寧年間因為占城「復擾邊」所引發的越占衝突，導致中越關係也產生變化，在結束了中越之間的武力衝突後，李常傑在英武昭勝年間開始駐守九真地區，此後李常傑在九真經營十九年之久，基本上李常傑在九真的經營，與對占城地區的控制似乎有密切的關係。

在有關的記載中，和李常傑有關的占城戰役有三次：一次發生在聖宗天貺寶象二年；這一次戰役《大越史記全書》《越史通鑑綱目》以及《通鑑綱目節要》皆失載李常傑隨聖宗征占城事，而《越史略》《歷朝憲章類志》及《仰山碑》則記載常傑在此戰役，因擒制矩而授「輔國太傅、遙授諸鎮節度、同中書門下、上柱國、天子義弟、輔國上將軍、開國公」。是役，占城主制矩「以地哩、麻令、布政三州贖罪」。第二次占城之役在仁宗太寧年間，這一次的戰役，《越史略》、〈仰山碑〉不載，《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含《前編》）和《歷朝憲章類志》均置於太寧四年四月侵宋戰役之後——是年的八月；然《通鑑綱目》與《綱目節要》則認為應該依據中國史書記載，將伐宋戰爭改為四年十一月，占城之役則在戰爭之前的四年八月。第三次戰役是在仁宗龍符年間，李常傑因演州人李覺叛變，詔李常傑討伐李覺，李覺敗，逃入占城，引占城寇邊，取回制矩所獻三州地，龍符四年二月李常傑擊破占城軍，收回三州地。這一則記載除《越史略》、及碑文外，其他文獻資料均有錄。<sup>63</sup> 在這三次戰役中，第二次的占城之役之後不久，李常傑即開始駐守九真，而在他駐守九真的十九年中，文獻資料中沒有越南李朝與占城之間的衝突；更有趣的是，當李常傑回都城之後（龍符元年），占城又開始有了李覺之亂（龍符三年），由此可推見李常傑鎮守九真的重要性。同時，由碑誌中的記載，也可以知道李常傑與九真地方勢力的結合。而這個結合更可以說是李朝後期歷史發展的主要關鍵。<sup>64</sup>

## 五、結論

在中國的記載中真的沒有李常傑的記載嗎？《夢溪筆談校證》卷二十五〈雜誌二〉有一則記載：

自公蘊據安南，始為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偽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號鸞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sup>65</sup>

<sup>63</sup>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三，頁 255；《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四，葉三下～五上（頁 720～723）；《越史綱目節要·越史正編節要》（[越]鄧春榜輯，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VHv02738）卷二〈李紀·仁宗皇帝〉，葉七（頁 80～81）。

<sup>64</sup>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考耿慧玲，1999,7,〈越南李朝太傅劉氏兄弟墓誌考證及其歷史意義——中越政治文化比較研究〉《朝陽學報》第五期，（台中霧峰），pp.151-192（已收入《越南史論》，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及 2003,12,〈李英宗婚姻關係與權力結構研究〉，《中外關係史一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pp.481～498（已收入《越南史論》，2004,新文豐出版公司）。

<sup>65</sup> 《夢溪筆談校證》卷二十五〈雜誌二〉，頁 818～819。

又，《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四裔考〉：

神武五年<sup>66</sup>日尊卒，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贈授乾德襲封如故。

乾德幼，母黎氏號太妃，與宦人李尚吉同主國事。<sup>67</sup>

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起神宗熙寧九年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

始，趙鼎與郭逵言：「交賊怵於李尚吉、李繼元之謀，故叛。」<sup>68</sup>

在這三則記載中，都提到李仁宗乾德即位時，有一位「宦者」李尚吉，與黎氏太后共掌國事，同時在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但是在越南的史籍中卻只有《大越史記本紀》卷三，提及李尚吉：

（英武昭勝六年）冬十月，太師李道成卒。初，靈仁垂簾，李尚吉以御宙被親寵，干預政事，道成與不協，遂補外。<sup>69</sup>

案，文中的御宙，據原注乃「李朝中官別名」；再看同書對於仁宗即位之初相關的記載：

（神武四年）太子乾德即位於柩前，改元太寧，年七歲，尊生母倚蘭元妃黎氏為皇太妃，嫡母上陽太后楊氏為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太師李道成夾輔之。<sup>70</sup>

又，太寧二年：

幽皇太后楊氏，尊皇太妃為靈仁皇太后。靈仁性嫉妒，以生母不得預政訴于帝，…帝年幼不能辨，乃幽皇太后及侍女七十六人于上陽宮，逼令殉于聖宗陵。…太師李道成以左諫議大夫出知乂安州。…三年…以李道成為太傅平章軍國重事。<sup>71</sup>

綜合以上的記載，可以推論仁宗初立之時，因年幼故由太后與顧命大臣同輔政，而太后有仁宗生母靈仁太后（倚蘭太妃）與嫡母上陽太后，顧命大臣則為宗室李道成；接踵而來的是靈仁太后的一次奪權行動，將上陽太后及其侍女七十六人逼死，同時行動的可能是御宙李尚吉，李道成因此被排擠出朝廷，出任乂安州，朝政由靈仁太后與李尚吉共同掌理。太寧四年（宋熙寧八年）在靈仁太后與李尚吉的主政下，起兵侵宋。若是將〈仰山碑〉對於李常傑的記載作比較，可以發現，碑銘中的李常傑是這樣的：

太寧初，今上明孝皇帝握圖即位，公遂以伊霍之量，使攝大政，可屬社稷。頃者宋境窺窬國家，公運廟筭之圖，統軍殲殛，三州四寨，倏如拉朽。未幾，宋師亟臨如月長江，誓報三州之讎。再勒軍以禦之，以辯士而議之，無勞渠魁，縱施血衅，而保寧宗祏。地愛其永，彌加寵敬。英武昭勝初褒

<sup>66</sup> 按，據越南史書的記載，並無神武五年，李聖宗卒于神武四年，即西元 1072 年，歲次壬子，春正月，皇太子即位柩前，故而是年二月即改元為太寧元年，並無神武五年。見《校和本大越史略》頁 61；及《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頁 246。

<sup>67</sup>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四裔考〉葉二十九～三十（235-409～235-410）。

<sup>68</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起神宗熙寧九年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頁 6830。

<sup>69</sup> 《大越史記本紀》卷三〈李紀〉，葉二十。

<sup>70</sup> 《大越史記本紀》卷三〈李紀〉，葉九。

<sup>71</sup> 《大越史記本紀》卷三〈李紀〉，葉九～十三。

天子義弟，知愛州九真郡清化鎮諸軍事，封食越裳萬戶。<sup>72</sup>

因而，碑銘中的李常傑與中國史書中記載的李尚吉，有相當類似的境遇。李尚吉是不是就是李常傑呢？若多一分的推論，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樣的巧合未免太過巧合，因此，中國史籍中的李尚吉或許就是越南史籍中的李尚吉，而越南史籍中的李尚吉也許就是越南碑銘中的李常傑。但是李常傑也在越南史籍中也同時出現，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名字，或者何時改的名字，因為沒有進一步的證據，目前也只能是一種推測，不敢肯定的說死，只能在本文中留下一些懸念，期待有更明確的證據出現，解決這個問題。

越南號稱小中國，較之同屬中國文化區的朝鮮，越南因為語言結構的關係，與中國文化更減少了一些隔閡。然而政治上的取捨，或許影響到中越對於歷史內容的記載，在李常傑的事蹟中，可以看到一個重要關鍵人物在歷史舞台上的消逝或誤釋，這些或許是因為中越因為政治上的隱諱、避忌、偏見等等因素所造成，唯有靠著文獻的相互校證才能還原部分的史實，而透過對於李常傑的認識，也才能夠真確的瞭解真正的越南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面貌，在相對於中原的遙遠南方究竟發生了一些怎樣的事實。而這種事實的還原，才能真正的反思中國歷史發展的動能，及其極限在怎樣的地方，歷史的借鏡才能夠給予後世真正的啟發。

---

<sup>72</sup> 〈仰山碑〉，頁 165。